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八年

第**九三四五**次会议

2023年6月13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主席:	阿尔姆海里女士/ 阿布沙哈卜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成员:	阿尔巴尼亚	霍查先生
	巴西	小德阿尔梅达先生
	中国	张军先生
	厄瓜多尔	佩雷斯·卢塞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先生
	加蓬	伊蒙戈特先生
	加纳	阿夫里耶先生
	日本	石兼先生
	马耳他	弗雷泽夫人
	莫桑比克	科莫阿内女士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瑞士	列伊女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卡里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里先生

议程项目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

2023年6月5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23/408)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601)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

2023年6月5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23/408)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热烈欢迎各位尊敬的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别代表。他们今天与会凸显出正在讨论的主题的重要性。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丹麦、埃及、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拉脱维亚、黎巴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绍尔群岛、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洛哥、荷兰王国、尼加拉瓜、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文尼亚、西班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乌克兰和越南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主管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先生、哥伦比亚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长老会成员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龙先生阁下以及国际农业研究协商组织气候、和平与安全专家萨尔玛·卡德里女士。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还邀请以下人士参加本次会议：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奥洛夫·斯科格先生阁下、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阁下、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兼代表团团长劳拉·奥尔森女士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常驻联合

国观察员兼代表团团长利蒂希娅·库尔图瓦女士。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3/408，其中载有2023年6月5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信中转递了关于正在审议的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现在请拉克鲁瓦先生发言。

拉克鲁瓦先生 (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今天召集我们讨论气候、和平与安全问题。我还要感谢给我这个机会介绍情况。

过去几年中，大多数联合国和平行动都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安全和政治环境。除其他跨界挑战外，环境退化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极端天气事件正日益挑战我们执行任务的能力。

今天，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估计，约有35亿人生活在“气候热点”地区，与气候相关的和平与安全风险只会愈演愈烈。正如气专委第六次评估报告所述，气候风险和非气候风险，如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暴力冲突，将日益相互影响。我们已经看到，面临脆弱性的成员国和面临气候变化的成员国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在最易受气候影响的16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驻有联合国外地特派团，即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南苏丹、阿富汗、索马里、马里、海地和也门。还必须指出，大多数联合国和平行动都部署在高度受气候影响和高度性别不平等的环境中。

联合国外地特派团并不掌握全球气候变化现象的最终解决办法，解决办法必须体现为适应、减缓和融资。但是，联合国和平行动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的特派团亲眼目睹了气候变化和不安全造成的双重脆弱性。在多个驻有特派团的国家，气候变化正在减少自然资源，影响社会凝聚力并引发冲突。例如，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了季节性天气模式变化导致的流动路线的改变如何加剧了牧民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在马里,这一挑战与对雨浇农业的高度依赖产生了消极的互动影响,雨浇农业因气候变化而遭到削弱,而同时需求却因为人口增长增加。

在南苏丹,10个州中有8个受到洪水影响,导致临时和长期的流离失所。这正在让不同的社区挤在一起,加剧了对资源的竞争。洪水降低了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机动性,因为他们不得使用需求大而供应不足的直升机或船只。当然,我们的人道主义同事也是如此。南苏丹的军事工程师被调去全天处理洪水和修筑堤坝,这样他们才能够保护重要的基础设施,如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自己的基地、主要道路和简易机场。

在索马里,多年的冲突摧毁了国家和社区的复原能力。当前的干旱是40年来最严重的,加剧了脆弱性,导致流离失所、饥饿和不满情绪。

在伊拉克,缺水、气温上升和沙尘暴给族群间关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在这些地方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气候变化的连锁效应正在重塑我们预防冲突、缔造和平、建设和平以及维持和平工作的范围。正如安理会在许多情况下所要求的那样,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考虑气候变化因素不再是一种选择。

气候脆弱性和不安全相互交织也是在关于《新和平纲领》的全球协商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议题,表明这个议题越来越重要。

我们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寻求同时减轻安全风险,以便能够一举两得,创造一个更具复原力的未来。将气候视角纳入和平与安全努力还意味着扩大和欢迎一批更加多样化的决策者。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强调,妇女切实参与气候适应和自然资源方面的决策,可带来更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成果。

总的来说,建设和平和政治事务部(政治建和部)和和平行动部都在努力将气候方面的考虑纳入我们的工作。气候安全机制就是在这一雄心的驱动下创建的,

这是政治建和部、和平行动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间的一项联合举措。自2018年起,该机制向会员国、区域组织和联合国实体提供多学科支持,使它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气候、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

根据我们的任务规定,我们确定了联合国外地特派团的若干优先行动领域。第一,我们正在大力提升联合国和平行动预测和处理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之间联系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外地特派团配备了气候、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专门能力,情况因此而改观。将气候因素纳入各方面工作,加强了特派团执行安全理事会授权任务的能力。

例如,在南苏丹,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气候、和平与安全顾问正在通过气候变化工作组,在南苏丹的人道主义、发展及和平与安全行为体之间提供培训和加强信息共享。该顾问还支持国家、地区和社区各级的政府对应方应对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例如,其中包括与政府间发展组织合作,支持受洪灾影响国家的社区间对话。

创新和数据分析是能力建设的关键领域,我们的外地特派团的气候、和平与安全顾问可以推动这些领域的工作。在创新伙伴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使用卫星图像和机器学习来更好地了解气候趋势,提高预警能力。加强收集、利用和分析数据的能力,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以及管理这些风险的良好做法的影响。

第二,我们正在加强气候行动和我们和平与安全工作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缔造和平是一个需要采取对气候敏感的办法的领域。技术合作可以为各方之间的对话和建立信任开辟新的切入点,并有助于确保和平协定的长期可行性。去年发布的政治建和部了解气候情况的调解实践说明为这一领域提供了指南。

在掌握气候信息的情况下建设和平还可能带来互补的好处。气候行动和建设和平有着许多相同的目标,即建设有韧性、公正、包容的社会。对在这两个领域的参与加以协调,可以同时推进多个目标。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六次评估报告证实了这一点，该报告强调，对气候和性别问题敏感的建设和平办法为建设和平提供了新的潜在途径。

然而，妇女应对气候影响和推动建设和平的能力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尽管她们在水和粮食供应方面的作用使其成为变革推动者。秘书长的建设和平基金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在也门，水资源短缺因气候变化而加剧，成为不稳定因素，基金帮助加强了里马干河谷的地方水治理架构。通过采取创新办法，让妇女参与地方水资源管理和争端解决，该项目成功地增加了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减缓了社区间的紧张关系。

总体而言，自2017年以来，基金已为世界各地21个不同实体实施的70多个气候知情建设和平项目，特别是西非和萨赫勒的此类项目提供资金。在过去五年中，在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10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是建设和平基金项目的受益者。

在基金的支持下，最近完成了一次对气候相关项目的审查，这有助于我们确定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领域。其主要结论之一是，必须采取灵活的跨界办法，投资于建设和平和对冲突敏感的气候行动。

加强气候行动、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协调不仅在政策上势在必行，而且在经济上也有其意义。使建设和平和气候融资机制——包括联合国和非联合国机制——保持一致，将使我们能够优化系统，以更高效、更有效的方式利用有限的资源。

第三，在联合国努力地更加积极减缓气候变化之际，我们越来越有必要避免成为气候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因此，我们正在努力减少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包括更好地向高效利用能源转型以及更多地依靠可再生能源。

今天，最大规模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几乎完全依赖使用昂贵进口柴油的发电机，而这些柴油往往需要在非常危险的条件下运输。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特派团是东道国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单一源头之一。另一方面，许多东道国属于世界上电

气化程度最低的国家，其社区的能源成本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可再生能源往往是一种较便宜的能源，但东道国和东道国社区很少从气候和可再生能源投资中获益。在2021-2022年期间，联合国和平行动所用电力的6%来自可再生能源。在《和平行动环境战略》的指导下，联合国正在逐步采用可再生能源解决办法，减少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尽量减少燃料运输队的安全风险。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美国和尼泊尔为在南苏丹拜克部署大规模太阳能混合动力系统而开展合作，前景可期。

在业务支助部的支持下，和平行动目前正在考虑如何使其自身的能源需求、所造成的影响和基础设施投资能够积极推动东道国做出努力，更好地利用清洁能源。联合国在马里和索马里的和平行动也通过与东道国和私营部门的合作，采用创新的可再生能源采购方法。

为了在其他特派团驻地获得类似的机会，必须得到东道国政府、私营部门公司和发展行为体的支持。我们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挪威发起和平行动利用可再生能源契约，这是把合适的伙伴汇集在一起的重要工具。该契约旨在减少维和特派团的业务成本、安全风险和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为东道国社区留下有益的基础设施遗产。

将于今年12月在加纳举行的2023年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长级会议将为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更多机会，为此，应为满足联合国的各自需求作出承诺，无论这些需求是专门能力，还是新的或扩大后的能力建设和培训，或是为环境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提供装备。

鉴于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且我们工作的地区冲突动态的变化日益广泛，我们必须继续适应气候变化。只要共同努力，我们就可以建设一个预防冲突、建设和平、缔造和平与维持和平的努力与我们解决气候危机的承诺相辅相成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拉克鲁瓦先生

的通报。

我现在请桑托斯·卡尔德龙先生发言。

桑托斯·卡尔德龙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再次来到安全理事会。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代表团的邀请。

请允许我在发言的开头讲一则轶事。在我即将宣誓就任哥伦比亚总统的那天，我去了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这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美丽的山脉之一，也是我国常驻代表的出生地——向我们的兄弟，即生活在那里、以西班牙殖民前文明保存最好而闻名的土著人民——科吉人和坎库阿莫人——征得许可。

他们赐予我祝福，一根节杖和一项授权。他们告诫我：

“要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建立和平，但也要同大自然建立和平。除非你也同大自然母亲建立和平，否则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就不会成功”。

他们要求我完成使命后回来复命。正如安理会非常清楚地知道的那样，经过六年谈判，我们结束了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长达50年的战争，该游击队已不复存在。

我要借此机会对安理会多年来为哥伦比亚和平进程提供的巨大支持深表感谢。这一支持仍然至关重要。它表明，安理会如果团结一致，就能够为世界各地和平与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哥伦比亚和平协议，即《结束冲突和建设稳定持久和平的最终协议》，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包括一个关于性别问题和族裔问题的章节。受害者及其权利成为谈判的中心。此外，由于大自然也是受害者，环境保护出现在该协议的所有章节中。修复大自然实际上是具体提到的针对那些对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负有最大责任者实施的制裁之一。

由于该协议未得到切实执行，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留下的一些地区，暴力和砍伐森林行为有所增

加。另一方面，在许多地方，前作战人员和群众走到一起，保护我们的森林和河流，并促进生态旅游。这是和解——不仅是人与人和解，而且还有人与大自然和解——的一个良好例子。

2018年，在离任两个月之前，我回到内华达山脉交还节杖。作为已经完成使命的证据，我给了科圭族和阿尔华科族首领三件东西：一份和平协议、关于我们非常积极的环境政策的信息以及2015年在这座大楼这里批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文本。哥伦比亚在该文本的构思方面曾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叫我保留节杖，因为我的使命并未完成。他们声称，可持续发展目标缺少最重要的层面——精神层面，这一层面意味着人类必须接受并且明白：生命是自然；河流、海洋和树木都有生命，都有权利，都应被当作平等者来对待。他们说得对。

昨天我从梵蒂冈回来，在那里，方济各教皇邀请了30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参加首次世界人类博爱会议。在我们的宣言中，我们呼吁建立环境博爱，与自然建立和平，因为“万物相互关联”。安理会应拥护这一呼吁。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忽视大自然及其在维持人类和地球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科学现在清楚地表明，我们如果要扭转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稳定的影响，就必须稳定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生物多样性损失和气候变化不能分开处理。在像我国这样的国家，保护森林比减少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更加有效，前者与后者同样重要。

今年在迪拜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不能继续推迟作出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决定。

即将召开的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8届缔约方大会）可以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将是把《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挂钩，确定这两项公约中的共同承诺和行动。更好的结果是，我们可以把它们合并成一项公约。我知道，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

的理想。关键是，两公约应共同行动，确认应当保护大自然并为此提供充足的资金，以确保其作为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危机根本解决办法以及作为实现并维护和平必要条件的作用。

我是纳尔逊·曼德拉创立的独立领导人团体“长者会”的成员。这个团体的前任主席是科菲·安南，现任副主席是潘基文。“长者会”一致承诺倡导和平、人权、正义以及可持续的地球。我们的使命是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挺身而出，应对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威胁：气候危机、大流行病、核武器以及现在还有人工智能。应当紧急规范人工智能。

我们感到担心的是，人们正在失去对这个多边体系的信念。不断加深的分歧正继续损害安理会履行其核心任务授权的能力。在这方面，我赞扬作为第28届缔约方大会主办国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作出明智决定，把气候与和平与安全列入议程。尽管安理会一些成员希望把气候变化和安全作为单独的问题来处理，但在现实世界中，气候变化和冲突的后果非常明显地汇合在一起。

气候变化加剧人的安全面临的威胁，战争以诸多方式破坏自然和环境，从摧毁大坝——就看一下乌克兰吧——到袭击输油管道以及维持农村社区的农田——请看一下我国。尽管由气候变化驱动的冲突和流离失所对妇女产生了格外严重的影响，但妇女在寻找解决办法——从在也门解决当地水资源纠纷到在哥伦比亚抵制环境犯罪——方面展现了巨大的领导力。

安理会必须加快步伐，尽责尽力，应对气候不安全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联合国其他实体和其他国际机构合作，寻找可持续和公正的解决办法。

安理会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以便在气候与安全问题上非正式专家组工作基础上再接再厉，更有效地把气候问题纳入联合国在实地开展的行动。这包括为维和特派团配备更多的气候与安全顾问，并将气候预测作为本组织预防工具包的一部分，以预测和缓解脆弱环境中的风险。

没有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没有和平就不

可能有可持续发展，就这么简单。只有当族群依赖的森林、土壤以及河流受到保护并且得到可持续的管理时，和平才能得到维护。

在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之前，国际社会必须帮助最脆弱的国家增强其复原力。这要从发达国家兑现其气候筹资承诺开始，包括到2025年把适应筹资增加一倍，多边机构还要大幅提高其财政能力。

我们需要大胆的政策行动。我们必须不仅在减缓和适应、而且在对大自然有积极影响的解决方案上加倍努力，包括养护具有高度完整性的森林、泥炭地、珊瑚礁以及为人类提供清洁空气与清洁水的其它生态系统。

最后，我谨呼吁安理会成员不仅在气候与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而且在安理会的整体授权任务上团结一致，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世界面临分裂为多个集团的风险，这些集团彼此争夺权力和霸主地位，而不是合作处理我们大家面临的空前挑战与生存威胁。我们必须团结合作，否则人类将消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桑托斯·卡尔德龙的通报。

我现在请卡德里女士发言。

卡德里女士（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今天邀请我来到这里，给我这个机会与安全理事会探讨气候变化与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以及它对阿拉伯地区的涵义。

有史以来，阿拉伯地区一直是孕育伟大文明的土地，为人类的进步做出重大贡献和突破。现在，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年轻的地区之一——我可以自信地说，尽管当前的挑战和过去几十年来它对的困难，它也是最具有韧性的。它是一个曾经经受——在某些地方仍在继续经受——冲突、政治不稳定、经济困难、沉重债务、财政空间缩小以及气候影响日益严重的地区。这使民众越来越难以保证基本的体面生活，迫使民众采用各

种手段和工具来适应和生存。

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不加紧努力，应对如此规模的气候危机，气候变暖将使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面临层层叠加的危险与不安全。该地区气候影响的科学证据是明确而有力的，我们的处境与大自然的力量绝对是不平等的。我借此机会，提请安理会注意在谈论气候变化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时对于阿拉伯地区重要的三个问题。

首先，在该地区许多国家，社会契约立足于提供负担得起的货物、商品以及基本服务，价格上涨推动民众骚乱和不稳定的情况曾多次出现。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气候变化破坏粮食、土地以及水系统稳定的情况下，确保粮食、水以及能源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景遭到破坏，这可成为破坏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特别是有鉴于该地区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地区之一，并且严重依赖粮食进口。

其次，冲突与脆弱性削弱治理，造成政治摩擦，并且破坏社会架构。它们还破坏实体的基础设施、水务基础设施、住房、教育以及医疗保健设施，扰乱各种复原力工具，把社会推上危险和不确定的道路。简而言之，冲突导致风险与挑战倍增，同时破坏可用来应对气候危机的工具。

第三，存在这样的全球性推动力和进程、包括能源过渡，如果其设计不为人类的发展服务，或者不给当地的发展带来裨益，则我们有可能强化同样的不平等，并且使冲突与脆弱性的根源得不到处理。我请安理会思考能源过渡对于阿拉伯地区的意料之中和意想不到的影响以及它对保持和平意味着什么。

需要做些什么？我将提出四点建议。但是首先，我想响应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前秘书长的《和平纲领》，这项报告帮助我形成了对许多这些问题的想法，那就是，预防外交、调解、维持和平以及建设和平的核心应该是处理冲突最深层的起因。因此，气候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应立足于预防、复原力、减少风险、公正以及平等。接下来我将谈谈我的四点建议。

第一，民众首当其冲受到冲突、气候危机以及系

统失调所致任何真空的影响。但是，民众处在适应、创造以及创新的核心。我吁请安理会重新思考和平与安全工具在支持民众创新和增强其复原力、尤其是妇女和青年的复原力方面效力如何。

第二，基于证据的及时和准确的知识对于妥善决策和干预始终至关重要。我建议安理会扩大为其决策提供信息的研究的范畴。一种做法是利用阿拉伯当地的网络、研究人员以及思想家，他们技能娴熟，通晓语言，并且掌握适当的文化，从而对适应气候变化的和平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理解。另一种办法是利用对于气候安全链举足轻重的粮食、土地以及水务系统方面的创新和先进科技，比如新近启动的国际农业研究协商组气候安全观察站，这是一个支持决策的工具，帮助各种利益攸关方了解气候如何加剧冲突的根源，气候变化发生在哪里，影响什么人，以及能够做些什么以减轻气候与冲突的恶性循环。

第三，过去几年来，阿拉伯地区对该议程的关注日益增多。最明显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主席发起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促进保持和平倡议。阿拉伯水理事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建立了在地区一级推进该议程的机制。气候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的主席首次专门设立了救济、恢复以及复原力专题日。就我而言，我在开罗为国际农业研究协商组的气候安全全球议程献计献策，以阿拉伯世界作为地区侧重点，旨在生成适合当地和具体情况的有关该话题的知识。利用这些区域进程作为地方一级和上至安理会之间的桥梁非常重要。

第四，气候筹资需要让那些最应得到资助的人受益。气候筹资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想强调几点。需要补偿那些对该问题贡献最少的国家，以使它们能够适应，并且应对灭失与损坏。需要简化的气候筹资工具，这些工具根据冲突中国家定制，使最需要者受益，并且为气候适应——该地区的首要优先事项——服务。

最后，我将提及拼图中最重要的一块：政治意愿。这种意愿恰恰是让我们人类与众不同的特性。只

要有意愿，我们就能移山填海，否则只能留在原地。我承认当前的任务极为艰难，但我敦促安理会创新和重新创造多边工具，以应对挑战，并确保斗争和困难不会传给我们这一代和未来的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卡德里女士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气候变化和环境部长的身份发言。

我要感谢桑托斯·卡尔德龙总统、拉克鲁瓦副秘书长和卡德里女士的宝贵见解。

2007年，安全理事会首次开会讨论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影响（见S/PV.5663）。在那次会议上，发言者对自然资源损失、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等气候灾害成为冲突催化剂的可能性表示关切。然而，气候变化及其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他们质疑安全理事会是否是促进和加快气候行动的适当场所。这场辩论的轮廓已经确立，尽管16年过去了，但并没有什么变化。然而，气候变化作为风险倍增器的威胁已不再是一种假设的情况。它就是世界各地各种冲突环境中的日常现实。科学研究揭示了脆弱性、气候变化和武装冲突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形成破坏性循环。

例如，在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利用非洲之角的持续干旱，在流离失所的社区中进行招募，并向绝望的农民和牧民征税。由此带来的青年党人数和资源的增長日益体现为其袭击政府和国际目标的能力增强。就在上个月，该组织的成员杀害了54名乌干达维和人员，他们是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成员，这一动态的影响显而易见。此外，中东——全球33个最缺水国家中的14个都位于中东——日益受到气候变化的困扰，加剧了国内和跨国紧张局势。例如，伊拉克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的影响，这已危及其冲突后的恢复，因为流离失所率上升，农业生计恶化，与邻国在水资源问题上的关系更加紧张。在南苏丹，持续的洪水加剧了本已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阻碍了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执行安全理事会保护

平民任务的能力。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加剧了牧区和农区之间现有的紧张关系，导致暴力冲突的爆发。

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性别暴力和不平等的蔓延，因为当自然资源和农业生产受到破坏时，妇女和女孩面临更加不稳定的处境。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变化的后果只会越来越严重，其累积效应有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尽管存在这些现实，安全理事会的反应仍然不够，原因有二。

首先，气候变化空前的规模和复杂性对我们多边系统的应对能力构成了独特的挑战。我们正面临一场全球危机，其中交织各种经济、政治、安全和历史因素，因而极难达成国际共识。

第二，尽管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差异很大，而且因具体情况而异，但不应被忽视。国际和平研究所最近的研究表明，我们未能轻易孤立区分和量化气候影响，但这不应阻止我们认识和解决气候变化和冲突相辅相成这一更大的问题。展望未来，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多边体系必须适应气候变化的系统性、缓慢性 and 分散性。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谈判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对策的主要国际政府间论坛，但它的作用从来不是排他性的。显然，应对气候危机需要其他论坛的具体专业知识，目前关于加强国际金融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中作用的讨论就证明了这一点。对安全理事会来说，这意味着接受创新的尝试，以更好地理解 and 处理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

安理会必须通过对气候敏感的视角来处理冲突。我们必须加强相关维和行动的能力和授权，将气候变化纳入其减轻和适应风险的战略及其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这可以通过利用气候安全机制的工作，向联合国特派团部署气候安全顾问，以及更多地利用安理会气候与安全非正式专家组来实现。此外，还应辅以秘书长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数据收集和报告。我们必须避免围绕安理会对该问题的审议出现两极分化。

利害攸关，不容忽视或诋毁那些对安理会管辖权有正当关切的人。我们应当提供机会，听取并接触来自一线社区的当地代表——特别是妇女和年轻人——以及推动气候相关倡议的区域组织，使他们能够提出符合其具体情况的解决方案。这不仅可以在讨论气候变化和冲突时纳入当地的细微差别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方法，丰富安理会的应对措施，还可以加强与各利益攸关方的接触，并制定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在不同但互补的论坛上，我们必须促成对这一多层次挑战的整体解决方案。在今年晚些时候将于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即将担任主席国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计划设立一个救济、恢复与和平日。这将是缔约方大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其目的是强调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的交叉点，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防止和解决气候对稳定造成的负担。因此，我们将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以应对严重缺乏可获得、可负担和充足的气候融资，特别是对经历人道主义和安全危机的国家和社区而言。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获得的人均资金比其他获得资金已经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还要少80倍。

安理会可能没有充分处理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在审议中选择忽视它，就有可能危及全世界人民获得长期和平与安全的可能性。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充分揭示和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如何相互作用，国际社会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以及我们如何合作建设更加繁荣、适应气候变化和平的社会。

我现在恢复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加蓬外交部长发言。

伊蒙戈特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我赞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倡议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我感谢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副秘书长和哥伦比亚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龙先生内容翔实的通报。我还非常感兴趣地听取了萨尔玛·卡德里女士内容丰富的通报。

在安全理事会内集中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再次凸显了考虑气候与安全之间的联系以及应对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影响极端重要性。这是我们的责任。

除了环境层面之外，目前的气候危机对世界若干区域的稳定构成明显威胁，特别是在非洲大陆，受气候破坏影响最严重的20个国家当中，有17个位于非洲大陆，大多数非洲国家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安全挑战。这一现实是加蓬呼吁确认气候脆弱性与安全之间关联的驱动因素之一。

尽管非洲对全球变暖的责任微乎其微，但它特别容易受到日益严重和不可逆转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这些事件无疑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破坏生计，造成大规模境内流离失所，并因而加剧社区紧张关系。

毫无疑问，与用水、干旱、荒漠化和经常性洪灾相关的制约因素都是削弱非洲之角和萨赫勒区域经济和社会结构、影响社区凝聚力以及改变其自然生境的祸害。因此，这些因素导致暴力和武装冲突复发，特别是在处于冲突或冲突后局势的国家，因为其政治制度和机构的能力非常有限，在应对社会经济挑战方面也很薄弱。

此外，气候变化的多重影响降低人们针对气候冲击实施生存和复原战略的能力，并助长非法活动。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中部非洲区域办）、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以及气候安全机制的2022年联合报告确认，有组织犯罪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增加、海盗行为以及刚果盆地雨林面临的日益严重威胁是气候变化对该次区域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影响。

由于气候变化及其有害影响，到2050年，非洲可能会有几百万境内气候移民。在发生这些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同时，受影响区域也出现不稳定局面，紧张局势、危机和冲突日益加剧。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口流动确实有可能造成紧张局势，进而发展成跨境冲突。例如，乍得湖面积的缩小助长该区域的冲突和移民潮，牧民和渔民经常为自然资源而发生冲突。我认为，在

冲突的预防与持久解决方面，将气候风险纳入冲突分析建模是一个好主意。由于气候导致人口流动，必须提供支持并作出规划，同时建设当地社区应对气候所带来变化的能力。

人类今天面临的许多政治、安全、社会经济和生态挑战日益复杂、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由于这种相互依存，必须采取有效和紧急行动，首先可以将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扩大到环境领域之外。气候与安全的关联必须系统性地纳入所有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地缘政治战略。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3月20日发布的最新综合报告证实气候威胁的严重性，并指出全球变暖没有减缓的迹象。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当务之急是认识到这一点，以便保护人民和领土，建设抵御气候破坏的能力，发展脱碳经济，加强减缓和适应措施，并预防和管理气候安全冲突，从而支持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进程。

为此，必须建立一种基于全面和包容性办法的对话，以中部非洲区域办、中非经共体和气候安全机制之间的三方合作为榜样，加强次区域和区域组织与联合国之间在气候安全方面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我们也必须利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现有战略和最佳做法。然而，提供相关的气候对策也意味着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提供可预测的充足气候融资，以便制定适应和缓解战略和措施，加强当地社区的复原力。为此，国际金融机构和捐助者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这是加蓬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阿里·邦戈·翁丁巴先生阁下参加将于6月22日和23日在巴黎举行的新全球融资协议首脑会议的基础。行动态势无疑将是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持下组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挑战之一，我对该国的承诺表示欢迎。这届会议将于11月30日至12月12日在迪拜举行。

最后，我要重申加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一贯承诺以及翁丁巴总统的明确决心。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受影响人口的生存

问题——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和平与安全所依赖的一个问题。这是一项集体责任。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以协调方式行动起来，齐心协力。无所作为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致命的，对后世后代的安全和生存也是不可逆转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加纳环境、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发言。

阿夫里耶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今天召开关于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的高级别辩论会。

我们欢迎主管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先生阁下以及哥伦比亚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长者会成员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桑托斯·卡尔德龙先生阁下所作的通报。我们同样感谢气候与和平与安全专家萨尔玛·卡德里女士从另一个角度发表看法。

作为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的成员，我们赞同德国代表即将代表该小组宣读的发言。

气候变化不仅仅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它正在助长和加剧对世界若干区域，特别是萨赫勒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气候变化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密切关联不能再被否认或忽视，因为气候变化对各国稳定的不利影响表现为冲突、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以及国家存在进一步缩小或被取代。

例如，在非洲，从乍得湖区域到萨赫勒和该大陆其他区域，我们正在目睹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多重影响，包括粮食和水源不安全以及气候导致的流离失所。在乍得湖区域，由于该区域的干旱，乍得湖的面积比1960年缩小了约90%，并引发了农民和牧民之间的暴力事件。随之而来的生计丧失和社区复原力削弱被恐怖团体用来招募受影响社区的弱势群体并使他们变得激进，试图取代国家。

当我们面临对区域稳定的前所未有和日益恶化的生态威胁及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时，我们必须利用现有的全球和区域工具。其中包括《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非洲联盟气候变化和韧性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2022-2032年)》，以扭转气候变化及其对安全的影响。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重申了气候威胁的现实，认识到它不仅加剧冲突原因和后果，而且还影响社区和机构在具体情况下帮助缔造和建设和平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努力看到我们的观点在这样一个概念上趋同，即当我们寻求解决冲突时，气候风险——在相关情况下——必须作为和平努力的一部分加以处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要强调以下几点，我们认为这几点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不利影响至关重要。

首先，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前所未有的安全风险支持我们的信念，即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可以发挥作用，并应该继续在其议程上找到空间来讨论这一问题，并补充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

第二，安全理事会可以通过鼓励政治特派团将气候视角纳入调解与和平谈判并使之主流化，从而更好地将气候变化纳入其和平努力。提高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的能力，使它们能够在整个联合国预警和规划进程以及其它预防措施中不断评估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会，也将是有益的。将针对气候的语言纳入包括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在内的一些和平行动的任务中是一个范例，应在存在这一挑战的其他特派团中加以鼓励和推广。这应包括利用联合国进行的风险评估的结果，以便使特派团维持和平的努力更加强劲有力。

同样重要的是继续利用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和气候安全机制的工作来处理这一问题。作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部队派遣国，加纳鼓励包括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和捐助伙伴支持那些利用创新工具来减少其在受气候变化严重影响地区碳足迹的和平行动。

第三，我们可以通过鼓励将气候脆弱性问题纳入秘书长的报告，进一步巩固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取得的成果。这将提高能见度，并促进采取创新和强有力的

措施，使联合国特派团能够适应气候情况并有效应对。

第四，提供充足资金对于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仍然至关重要。我们强调持续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等联合国机构接触的重要性，并欢迎建设和平基金自2017年以来为安理会议程上国家的气候安全相关项目拨款。正如报告所表明的那样，每投资1美元，气候适应投资的回报在2美元至10美元之间。在这方面，为资助包括抗灾能力建设和风险评估在内的气候活动提供多边和双边支持至关重要。我们注意到并欢迎发达国家承诺并渴望在2020年至2025年期间每年共同筹集1000亿美元用于气候融资，并鼓励在这方面做更多工作。

第五，深化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机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不安全方面的合作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鼓励加强区域和国家行为体的能力，以增强其预警系统和数据分析能力，这对区域预防行动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国际社会对非洲多灾种预警和早期行动系统减少灾害风险情况室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区域气候战略的支持，仅举几例。利用与此类区域安排的伙伴关系，将进一步加强和建设抗灾能力，并有效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

最后，在处理气候和安全问题时，我们绝不能忘记将妇女、女童和年轻人纳入有针对性的政策，承认这些群体在建设抵御气候变化能力方面的作用。

最后，加纳认为，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显而易见，需要国家、区域乃至国际社会认真致力于建设抗灾能力和保护我们社会的福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莫桑比克国家管理和公职人员部部长发言。

科莫阿纳女士（莫桑比克）（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文口译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女士，莫桑比克荣幸地感谢你邀请我们参加本次关于气候与和平与安全关系的重要辩论。这一专题领域是莫桑比克作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任务中的一个优先事项。我谨代表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菲利普·雅辛托·纽西先生阁

下,向安全理事会成员以及出席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席期间组织的本次高级别公开辩论会的各国和各组织的所有代表致以问候。我们还要借此机会祝贺新当选为2024-2025年任期安理会成员的国家。

今天的辩论会为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系统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以重申其承诺,并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事件负面影响的所有受害者表示声援。作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莫桑比克主张在所有可能有助于促进人类福祉的专题问题上采取干预主义多边主义。这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减轻其影响的全球议程,特别是考虑到气候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日益不可避免的联系。

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气候变化与全球恐怖主义一起在地球的每一个纬度和经度都构成威胁和祸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这一邪恶,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气候变化并减轻其影响。这证明了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此外,正如已经证实的那样,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一直在以灾难性的速度增加,这给要求它们将灾害风险管理办法系统化的各国政府带来了挑战。举例来说,由于降雨不均,一些国家一直面临长期干旱。鉴于洪涝和飓风给基本基础设施造成的破坏,这种状况引发粮食不安全,并且使民众的生活质量下降。

极端天气事件,即干旱、洪涝和飓风的有系统和显著发生,促使大量民众从风险区转移到被认为是安全的地区,给接纳地区本已匮乏的生计资源造成巨大压力。这些因素往往导致冲突发生或增多。

莫桑比克即为一例。我国一直周期性地遭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2019年发生的“伊达”和“肯尼斯”飓风造成索法拉、赞比亚、马尼卡、太特、楠普拉及德尔加杜角等省约50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最近的“弗雷迪”热带气旋给莫桑比克中部地区造成破坏,殃及约130万人。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以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为参照,并将其作用力视为控制领土的需要和自然资源匮乏所造成的冲突的驱动因素之一,它对建设国际和平

与安全这项事业则具有负面影响。

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们有责任重申并加强我们的集体承诺,包括在我们各国越来越多地动员非国家行为体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加强责任感,分享经验、信息和战略,以期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负面影响。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在和平支助行动中,气候变化的影响巨大,因为在许多地理现实中,维和特派团任务目标的执行工作因不利天气现象受到严重挑战。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近的情况就是如此,那里的暴雨限制了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的工作;在叙利亚,地震及其后的暴雨制约了联合国在那里的人道主义行动。

同样,联合国维和特派团面临武装团体——其中一些是恐怖团体——数目增多的现象。这些团体利用气候变化的影响造成的脆弱性,即粮食和水资源短缺,以及人口密度地理结构的变化,在半废弃地区扎营,并制定许诺提供日益稀缺资源的招募战略。这些事件与利用已有的脆弱性,重点是农业、交通和基本环境卫生等基本基础设施的脆弱性有着内在的关联。

虽然气候变化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各国感受到的后果和影响程度不同,这也是事实。与其他任何地区相比,非洲国家因其社会经济状况受到的影响最大,这给经济、粮食安全以及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网络造成灾难性后果。水文循环的改变和重新定义,在温度升高和流量减少的情况下水质恶化,再加上武装冲突,往往是将非洲民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置于日益脆弱境地的因素。

在这一可悲和不可避免的现状中,我国莫桑比克因地处沿海和热带地区,也受到了影响。我们是周期性地受到极端气候现象影响的国家之一,除其他后果外,这种现象还造成人畜死亡、公共和私人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如前所述,最近在飓风“弗雷迪”2月份过境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鉴于这种地理脆弱性及我国的分担责任观,莫桑比克一直积极主动地制定集体解决方案,具体表现为

核准和执行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重要治理文书；随时准备参加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所有气候问题会议。南共体人道主义和紧急行动中心在莫桑比克北部纳卡拉市的设立，证明我国致力于解决管控恶劣天气事件造成的灾害风险这一问题。

最后，我要重申，莫桑比克感谢在安全理事会层面纳入气候、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这一议题，这表明我们对气候变化与全球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的集体承诺和参与。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发言。

克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同其他人一样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和我的朋友桑托斯·卡尔德龙总统阁下。我也非常感谢萨尔玛·卡德里女士为本次重要讨论会创造了条件。主席女士，我感谢你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领导下，就气候危机对安全的影响召集本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我特别注意到莫桑比克代表的意见，他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影响的不公性，实际上界定了我们大家都面临的这场危机将产生的一种威胁的性质，那就是，它是影响和起因分布不公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详加阐述。

首先，我想对各位说，现在无可争议的是，气候危机是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不仅对发达国家，而且对整个地球及其自身承载的生命，都是如此。这场危机今天已让各国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我们现在所花的钱甚至不是为了进行预防，而只是为了收拾残局。最重要的是，它夺去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也对地球家园所有地方民众的生计与和平构成严重威胁。

我们亲眼看到，而且根据观察发现，面对极端温度危机的最严重后果，我们实际上毫无安全防护。此类观察结果比科学家预测的数目还要多，出现的速度还要快。目前，每年有数百万人确实因酷热而死亡。我们看到疾病传播和虫害的影响，这些害虫寿命延长，袭击各国比以往更加依赖的树木和森林，由此造成粮食损失。我们看到，大规模迁移产生的混乱已几乎达

到预测的程度，如果全球正在发生的生物破坏继续下去，这种混乱将会更为严重。我认为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且未必是因为各国的主动选择，因为全球经济将某些进程强加于它们。

全世界每年有700万人死于温室气体污染的影响，在该问题上没有和平的解决方案可寻。我认为，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频繁地称之为污染，因为情况本来就是如此。若不采取行动，气候危机所致破坏的成本将会增加，其影响范围将会扩大。公平地说，我们去年所经历的世界会比今年我们正要经历的世界更美好，也比我们在可预见的将来所看到的世界更美好，除非我们更好地克服这场危机。

这种损失将与很多战争造成的损失不相上下，甚至堪比当前进行之中的战争损失。去年，我们听莫桑比克部长说过，两次旋风先后袭击了从莫桑比克到瓦努阿图的大片地区。在美国，我们看到猛烈的龙卷风过后留下的死亡和破坏。仅在美国，数年前的三次风暴造成了大约2 650亿美元的损失。然而我们竟然找不到我们所需的1 000亿美元。今年我们将找到1 000亿美元。今年，我们将会有一 000亿美元。但是，想一想这用了多长时间。显然，我们曾有一位总统令人遗憾地让我们退出了《巴黎协定》，在其四年任期内没有为该问题分配任何预算资金，从而使我们退回从前。

今天，正如我们听副秘书长所说的那样，非洲之角经历了有纪录以来的最严重干旱，造成农作物歉收和粮食短缺，使维持和平工作举步维艰。去年10月，驻南苏丹的联合国维和人员不得不应对该地区所经历的最严重洪灾，使本已糟糕的冲突期愈加恶化。上周在纽约的每一个人不幸经历了应对空气质量的问题，当时我们都吸入了烟雾，能够亲身体会到因干旱和炎热而显著加剧的加拿大野火的影响。我不是说完全是由干旱和炎热造成的，而是说肯定因为它们而大大加剧。

没有合理的辩论。没有拖延的余地。安全理事会议程上有多少问题可以让人这样说？在这方面，没有对科学进行辩论的空间。危机日益严重。它在破坏我

们的集体和平与安全。没有安理会这个机构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所有政府实体协调一致的行动，危机对全世界的影响将愈加恶劣，它会继续更加严重地威胁我们的和平、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安全，日日如此，年年如此——只要我们不做什么我们明知必须做的事。

再者，我们不应当极力淡化我们遭遇的干旱、洪灾和火灾严重扰乱全世界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驱使世界各地民众流离失所的程度，这本身就造成混乱。本会议厅内没有人能够否认，某些国家的政治发生了何种巨变，而且不是变得更好，而是人员流动、我们面临的冲突以及我们的经济受到干扰的后果。去年，我们看到，仅仅一次天气事件就造成巴基斯坦3000万人流离失所。因此，若不采取行动，气候干扰造成的不稳定只会日益严重，气候诱发的事件将使我们的维和人员和我们各国军队越来越不堪重负。

若干年前，我国军方最高层，即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出结论：气候危机导致威胁倍增。所有造成战争或冲突的其他力量都因为这场气候斗争的后果而倍增。因此，我们欢迎讨论和平与安全问题，以及安理会主席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气候变化与环境部长身份在本会议厅宣布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气候公约第28届缔约方大会）。显然，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就必须加紧努力，并且比迄今更多地发出声音。

我们当然理解秘书长因为缺少行动而感到挫败，他也不断提醒我们这一缺失。我们必须承诺为秘书长的“全民预警倡议”提供资源，我们必须确保该倡议顾及最弱势民众的需求。我们必须把这些威胁纳入《新和平纲领》，并重新设想联合国系统自身如何有效处理这场危机对世界安全日益强烈的影响。

具体而言，我们必须确保把气候危机纳入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在全世界开展的预防冲突和调解努力。我们大家必须帮助实现这一点。我要提醒安理会各位成员，在美国这里，在我们终于使《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我们所通过的最重要的立法，已经对各项选择产生了巨大影响——签署为法律之后，拜登总统制

订了“总统适应与复原力紧急计划”，目前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5亿人在2030年之前适应和处理气候危机的影响。

有几位发言者提到，大约6个月之后，我们很多人将齐聚迪拜，参加气候公约第28届缔约方大会。已经授权了三方面的成果。第一是赢得适应力挑战。将发布一项适应力报告。第二，我们将处理灭失和损害，我们在沙姆沙伊赫已经成功改变了其态势，但是没有彻底改变。第三，将进行一次全球盘点，冷峻地评估我们的现状。不会让任何一方尤其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也绝不能仅止于此：它必须展示今后的路线图。这是我们能够向全世界提供的最佳盘点。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针对现状做出反应。我们是这样看待现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48个国家占总排放量的0.55%。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某些威胁。它不是某个国家在试图夺取更多领土。它不是政治手段，或者是某一位或另一位独裁领导人的支配欲。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自己。是每一个人。是我们选择如何为自家供暖、为我们的工厂照明以及驱动我们的车辆。是有增无减地燃烧化石燃料制造了这个问题。因此，问题是我们所有人是否行动起来，为它作出足够多的努力。

48个国家占排放量的0.55%。20个国家占总排放量的76%。我们在巴黎、格拉斯哥和沙姆沙伊赫都承诺走上将气温升幅限制在1.5摄氏度之路，但我们并没有都这么做。

我并不是来指责的。我们所有国家都需要共同努力。我们有技术；我们可以做事情；我们有一流的大学；我们有一流的实验室。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使我们能够团结起来应对这场危机。归根结底，只有一件事能拯救我们自己——实现科学家们给我们的减排目标。即使我们到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我们仍然要从大气中吸收1.6万亿吨左右的二氧化碳。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进行一些碳捕获才能做到这一点。

摆在我们面前的目标是绝对明确的--我们现在需要停止对新的、未减排的燃煤电厂的许可。未减排意

意味着我们将不会捕获到任何排放。我们需要汇集资金--这是数万亿美元的资金。我高兴地说,下周,马克龙总统将在巴黎举行气候融资峰会,希望我们将拓宽有关混合融资以及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条件的思路。

既然我们对这场危机有了了解,任何国家都不应制造新的污染源,无论这些污染源来自何处。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致力于我们的2030年目标,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目标,因为如果我们到2030年做的还不够,那么到2050年将不会出现净零排放。这一目标将无法实现。1.5摄氏度的气温升幅将会落空,将会消失。现在是决定性的十年,我们需要加快步伐,制定有关2050年的更好的计划、真正的计划。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以确保我们公民的安全,并确保整个地球的安全,这是一个不小的目标。

我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显然,空谈的时候早已过去。我们拥有实现到2030年减排45%所需的工具和技术,但并非我们所有人都在应用。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年对我们的警告,我们可以避免气候危机的最坏影响,但时不我待,时钟正在滴答作响。

这不是建设能力的问题,而是履行我们所作承诺的问题。我们在巴黎作出了承诺;我们在格拉斯哥作出了承诺;我们在沙姆沙伊赫重申了这些承诺;我们不能去迪拜只是再次重申这些承诺。

安全理事会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常任理事国还是非常任理事国,都必须重新树立雄心,下定决心打赢这场战斗。这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利益,而且利益均摊,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才能修复地球,保护所有国家免受世界上有史以来的一个最大威胁。我们仍然可以赢得这场战斗,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在今后几个月将获得大量机会,以帮助做到这一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士国务秘书发言。

Leu女士(瑞士)(以法语发言):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所说,对人类最具系统性的威胁仍然是气候变

化。在日益升温的世界里,气候安全与可持续和平密不可分。这就是为什么瑞士将气候安全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优先事项。

因此,我要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组织这次重要的辩论,并感谢它通过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主席持续作出承诺。

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执行在应对这些巨大挑战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我要感谢桑托斯·卡尔德龙总统、拉克鲁瓦副秘书长和卡德里女士的发言,他们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气候变化加剧了冲突的风险。因此,认识到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不可否认的联系至关重要。同样出于这个原因,瑞士支持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的声明。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加剧了全球紧张局势和冲突。上周,纽约的许多人都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是一场三重全球危机。炎热和干旱、风暴和洪水正在破坏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稳定。气候变化往往加剧了紧张局势、脆弱性和冲突的恶性循环。萨赫勒就是一例,正如民间社会代表迪乌夫女士上个月向安理会指出的那样(见S/PV.9322)。在南苏丹,持续的洪水使安理会授权的特派团无法充分完成保护平民的任务。

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我们的应对措施必须要有创新性。

首先,我们需要利用科学和新技术为预防冲突服务。例如,气候风险和预警系统倡议实施了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是该倡议的主要合作伙伴。这促使在脆弱国家发生极端事件之前迅速采取行动,因此是对预防冲突的具体贡献。另一个例子是国际移民组织的流离失所跟踪信息总库,它分析流离失所人口的数据。

对瑞士来说,融合科学和外交专业知识是一种战略方法。近年来,我们在日内瓦设立了一个气候变化对人类安全影响的专门知识中心,使整个联合国系统受益。

第二,我们建设和平和巩固和平的集体努力也必

须融合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联系。瑞士支持的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确认了这一必要性。要吸取的教训包括脆弱国家的气候融资，这必须反映当地的优先事项，在经济上赋予妇女权能，并重视年轻一代的专门知识。

第三，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规定必须对气候风险敏感。当地的现实已经促使一些特派团作出反应。气候和环境顾问在支持特派团将气候风险纳入其工作并减轻气候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气候安全机制是联合国各行为体和方案的一项联合倡议，也使联合国能够更系统地处理这些风险。主席女士，我要强调气候与安全非正式专家组的作用，我们与贵国和莫桑比克共同担任该专家组的主席。今年3月，我们同马耳他一道，在安理会启动了一系列关于气候、和平与安全的具体措施。我们邀请其他成员加入我们的努力。

气候安全是稳定的基石之一。我们不仅要将其纳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而且还要纳入《新和平纲领》之中。

不作为不是一种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安理会必须对气候、和平与安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采取行动。这是履行其任务的唯一途径，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小德阿尔梅达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通报者就这一重要问题发表的评论和看法。

巴西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行为体，历来致力于多边主义和可持续发展议程，我们将始终以建设性和一贯的方式采取行动，促进协调一致地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无疑是人类面临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如果不采取有效和一致的应对措施，我们将无法解决其根源及其对各国社会的不利影响。

去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期间，当时的当选总统卢拉提出了巴西将于2025年在巴西亚马逊地区主办第三十届缔约方会议的承诺，这表明我们对

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重新和重振的承诺。我们感谢最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所有国家在这方面表示赞同和支持。对于各国对巴西的信任，我们感到荣幸，并将以最高的优先地位致力于宣传第三十届会议，从而大力推进气候变化制度。

我们还期待着将于今年早些时候在迪拜举行的第二十八届缔约方会议。我们期待在多边气候变化机制的现有正式轨道下，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第二十八届会议期间进行的全球评估将是我们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时刻。它将指出取得的进展，并确定该制度中执行方面的主要差距，特别是气候融资方面的差距。我们相信，全球评估将对气候变化制度的未来以及两年后成功举行第三十届会议至关重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是讨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情况的最合适论坛。我们认为，在安全理事会范围内对这一议题进行专题和跨领域讨论既不会有成果，也不会有实效。这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而且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安理会插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发展支柱通常处理的主题。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其职能时，可以而且应该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应东道国的要求，支持它们在实地作出努力，以提高当地的复原力和建设能力。这并不意味着安理会有权或应该有权以专题和系统的方式来处理气候变化问题。

我们不要忘记，根据负责气候变化科学的多边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的说法，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相比，气候对冲突的影响被评估为“相对较弱”。气专委还强调，在贫困、治理面临挑战、获得基本服务和资源有限的地区，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更高，“造成高度脆弱性的发展挑战受到殖民主义等历史上和持续存在的不平等模式的影响”。

安全理事会不仅缺乏以一致、全面和有意义的方式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必要合法性，而且也缺乏这

样做的适当工具。《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的发展支柱已经拥有适当的工具和机制来应对根本的发展挑战，并在脆弱的情况下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我们必须回顾解决气候变化根源的承诺，特别是向低排放能源系统过渡的承诺。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都需要首先减少燃烧化石燃料。纵观我们的历史，碳排放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不是在冲突地区。例如，安理会没有适当的工具来解决关键问题，即提供气候融资以及实施集体缓解和适应努力的手段。

根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一次需求评估报告，到2030年，满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和优先事项所需的金额从5.8万亿美元到11.5万亿美元不等。如果气候变化确实是这些国家的优先事项，我们就需要在适当的论坛上看到在这方面取得具体和有意义的进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提供和调动新的、可预测的、额外和充足的资源是当务之急。

以《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为基础的多边气候变化制度，出于良好的理由，已经建立在一些原则的基础之上，这些原则确保平衡、透明度和包容性，而且其各项决定都基于作为《公约》缔约方的所有国家的共识。这与安全理事会的现实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安理会的运作方式和结构完全不同。建议安理会让非安理会成员和广泛的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关于气候、和平与安全的讨论来提高其透明度和包容性，虽然用意不错，但并不解决问题。安理会迫切需要开展一场深刻的改革，这正是因为它是不平衡、不透明和非包容性的。零敲碎打地作一些表面的改变，不会把安全理事会变成一个包容各方的机构。此外，受全球变暖不利影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例如，气专委指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可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部分国家之一。然而，本区域在安理会中的代表性很低。

最后，增加气候变化问题只会使安理会授权的特派团的任务负担过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特派团因其多层作用过度扩展，已经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在适当的论坛上处理这一问题，尤其是根据《巴黎协定》

兑现资金承诺，肯定会在实地产生更加切实的影响。

卡里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今天让安理会集中注意力关注这一议题。我也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桑托斯·卡尔德龙前总统和卡德里女士的重要通报。

自联合王国于2007年首次向安理会提出气候安全问题（见S/PV.5663）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我们关于冲突与和平与安全的工作，世界各地日益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实际影响和连带风险，这加剧了原有的脆弱性。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系是明确的，今天非洲和中东各国的部长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详细阐述——这两个区域是安理会大部分工作的关注焦点。我们现在必须采取紧急、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来应对这些威胁。我谨强调联合王国作为优先事项的三个问题。

第一，正如克里先生刚才有力强调的那样，必须增加和改善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获得资金的机会。我们正在努力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扩大公共和私人融资规模，为包括安理会议程所列国家在内的各国促进气候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和平。联合王国建立的区域风险池已经从非洲转移了10亿美元的风险，索马里今年收到了第一笔旱灾保险赔付款。今年7月，我们将在联合王国和纽约举办气候融资会议，包括为有人道主义需求的国家融资，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为这一议题做出贡献。

第二，我们必须确保在气候干预措施中考虑冲突的驱动因素。对冲突保持敏感认识的气候适应工作应该成为不稳定国家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必须将妇女、女童和地方行为体切实纳入正式系统和谈判工作。

最后，应根据《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和秘书长的全民预警倡议，将减少气候和冲突风险以及早期应对措施纳入人道主义、建设和平和方案。减少灾害的风险和影响对于确保持续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关于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3和关于冲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6至关重要。

联合国系统完全有能力协调气候、发展、建设和和平和安全努力。正如其他人所说,联合国特派团中的气候与和平与安全顾问发挥着重要作用。安理会可以做更多工作来为此提供支持,帮助推动在联合国各项活动中对稳定、建设和和平和气候适应型发展采取更加一致和综合的对策。

张军先生(中国):主席女士,中方欢迎您主持今天的会议,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桑托斯先生和凯德里女士刚才所作的通报。

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和各国发展的挑战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应对气候变化更显紧迫和重要。中方支持国际社会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渠道,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加强政策协调,加大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中方支持联合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全力支持阿联酋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相信在苏尔坦·贾比尔主席的领导下,会议将取得重要积极成果。

关于气候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安理会多次开会进行讨论,显然存在着意见分歧,还需要深入的探讨。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气候韧性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频发,严重损害发展成果,加剧资源紧张,引发族群矛盾冲突。同时,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气候变化与安全风险之间的关联十分复杂,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传导机理,目前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否定气候与安全之间存在关联,不是科学态度;将气候问题泛安全化,脱离具体情境谈论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恐怕也不是科学态度。关键是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为此,我们主张安理会应当结合自身授权、既有议程和具体国别的情况,结合所拥有的资源和手段,就气候与安全的关系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安全风险的根源,提出切实管用的办法。

海地近期洪涝灾害导致人道局势雪上加霜,这同

气候有一定关系,但海地的根本挑战仍是黑帮暴力和政治腐败。伊拉克面临着缺水、干旱和荒漠化等生态挑战,这同气候变化也有一定关联,但伊拉克最主要的挑战是外来入侵带来的严重后果。多年战乱包括外部势力使用贫铀弹,导致伊拉克生态环境发生难以修复的变化,战争遗留物使得大量土地无法使用。在安理会的工作中引入气候变化视角,如果忽视这些根源性问题,就把握不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也不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同样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都是极端气候,在北美和太平洋岛国之间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呢?显而易见,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背后是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因此,要阻断气候变化向安全风险传导,最根本的办法是从发展入手。帮助发展中国家跨越发展鸿沟,提高气候韧性和应对能力。在这方面,安理会不能成为清谈馆,追求“政治正确”,而要脚踏实地,结合自身授权,真正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安全风险做些实事。

第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是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遵循。《公约》所明确的基本共识是,发达国家对于全球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他们理应率先大幅减排,更早实现净零乃至负碳排放。遗憾的是,去年以来,一些发达国家能源政策出现倒退,化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不减反增,有关情况令人不安,

安理会要发挥作用,可以对这些情况予以密切关注。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说气候变化构成潜在的安全威胁,那么在履行减排义务方面消极倒退的行为,包括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是否也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安理会可不可以依据联合国宪章授权采取强制措施,纠正这些消极行为?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第二,资金不足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最主要瓶颈。发达国家在气候融资问题上有不少历史欠账,需要尽快填补每年1000亿美元的缺口,并制定2025年后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去年沙姆沙伊赫会议(COP27)

建立了“损失与损害基金”，发展中国家都在翘首以盼基金尽快运转起来。联合国相关机构应在推动资金落实方面发挥作用，包括建立气候融资落实情况监督机制，推动发达国家真正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

安理会要发挥作用，也应在这些方面发出强有力声音。同时，安理会要以行动体现自身作用。作为第一步，可以考虑授权派驻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国家的特派团收集驻在国每年接收发达国家气候融资的情况，定期向安理会作通报。当然，特派团自身也要在节能减排方面树立标杆、成为榜样，为驻在国气候行动贡献一份力量。

第三，发达国家绿色保护主义值得警惕。有的国家以推动本国能源转型为借口，通过各种不公平法案和行政举措，投入数千亿美元为本国制造业提供高额补贴，同时针对别国的绿色产业大搞贸易壁垒，掐断发展中国家获得绿色技术的路径。

这些行为公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扰乱全球绿色产业链和供应链，破坏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努力背道而驰。这些行为也让有关国家的漂亮口号显得苍白和虚伪。

安理会要发挥作用，应坚决反对这样的行为和做法。绿色保护主义成为将发展中国家绑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一道锁链，

另一道钳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稳定的锁链则是非法单边制裁。很多被制裁国家连最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都难以获得，更别说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了。安理会应该倾听受害国人民的呼声，高度重视绿色保护主义和非法单边制裁造成的气候和安全风险，并敢于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维护公平正义。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中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去十年，中国采取负责任态度，用行动落实承诺，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34.4%，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大力开展植树造林、防沙治沙，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帮助，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评价。

中方愿同各方继续携手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

佩雷斯·卢泽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主管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先生、哥伦比亚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长老会成员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龙先生以及国际农业研究协商组织气候、和平与安全专家萨尔玛·卡德里女士通报情况。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最近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许多气象和气候现象，使它们在世界所有地区都变得极端，毫无疑问，在最贫穷、最脆弱的国家以及处于冲突局势中的国家，情况最为严重。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国家对气候变化所负的责任却是最小。

安全理事会第一次讨论这一问题是在2007年（见S/PV.5663），但我们尚未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但是，我们已经能够应对可能将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视为风险倍增因素的情景。如所有联合国论坛和国际宣言所确认的那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为全面应对这一问题提供了指南，是谈判全球气候变化对策的主要政府间论坛。

我们今天关心的是探讨安全理事会如何确保气候变化不会成为安理会所开展工作的国家境内冲突的风险倍增因素。这就需要进行客观的分析，既补充和促进气候架构的作用，而不重复气候架构所发挥的作用，也不扰乱其融资方式。

国家自主被公认为建设和平的指导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巴黎协定》的基石。事实上，该《协定》的主要做法是将气候行动中的共同努力引导到国家自主作出贡献。为此，至关重要，应该为冲突局势中的

国家建设本国能力。在这方面，和平与安全以及重振法治和具有健全的机构都是至关重要的。

秘书长提出了一些及时的倡议，例如侧重于适应气候变化的“全民预警倡议”和适应基金气候创新加速器，后一机制使最脆弱的国家能够向多边基金提交在财政上可行的项目。此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设立了损失和损害基金，这是一个里程碑，证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正确的，我们希望该基金尽快投入运作。

在这方面，应对和克服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特别是受冲突困扰的国家面临的挑战，一个有效的做法是明确发达国家的承诺，自2020年起，每年调集1000亿美元，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筹资机制，将这些资金输送到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有资格优先获得这些资金的国家。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导致社会紧张局势。它们加剧、延长或助长发生冲突和不稳定局势的风险。在全球预防冲突战略中，我们必须将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作为核心内容加以考虑。长期干旱或洪灾导致人口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和公共卫生紧急情况，首先会造成人道主义后果。在这方面，特别政治任务与和平特派团必须与联合国国家办事处和区域办事处携手合作，这些办事处受益于专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工作人员。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联合国西非办事处的例子，该办事处去年设立了西非气候变化、环境、安全和发展问题区域工作组。此外，我们还欢迎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安全问题制定了具体路线图的区域倡议，非洲联盟和太平洋岛屿论坛已经这样做了。我们认为，实施这些倡议，具有积极和互补的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联合应对气候变化。为此，我们敦促发达国家带头在204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同样，厄瓜多尔支持全面纳入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尤其应该将性别观点作为联合国处理这一问题的广泛战略的一部分。

最后，我要重申，厄瓜多尔支持采取务实和建设

性的办法，进一步分析本次会议通报者提到的气候与安全之间的联系，逐例考虑冲突的根源，以期加强建设和平。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桑托斯·卡尔德龙总统和卡德里女士的发言。我们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筹备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所做的辛勤筹备工作。

我们认为，讨论气候变化造成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极为重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如此。然而，我们认为，在联合国，我们没有充分强调可持续发展问题在预防冲突一揽子措施中的关键作用，而只是从更广泛的背景中挑出与气候有关的问题。

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以及与不平等现象作斗争，对于建设具有韧性并且能够有效适应气候挑战的社会而言，都是关键要素。毫无疑问，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消除冲突的根源。

我们强调气候融资问题的重要性。我们提请安理会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发达国家是危言耸听、散布气候危机言论的大师。发表这样的民粹主义言论十分容易，但是，只要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讨论转向关于实际措施的实质性问题时，包括融资和技术转让、具体的适应措施以及为新设立的损失和损害基金捐款等问题，捐助国的所有热情都奇怪地消失了。我们敦促发达国家首先履行其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资源和技术转让，支持它们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而不是仅仅用这一受欢迎的议程来掩盖对所有可能的进程和机构的注意力。

尊敬的约翰·克里也谈到了融资问题。抗击气候变化负面后果意愿的真正试金石，是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落实向损失和损害基金捐款的决定的情况，而不是在安全理事会举行讨论。

是的，在某些特定国家和特定区域的局势中，气候因素可能是加剧冲突的另一个因素。然而，俄罗斯

联邦一贯认为，讨论气候变化不是安全理事会任务的一部分，这样做只会分散人们对冲突的主要原因——往往是社会经济原因——的注意力。

各种机构和研究中心的观点确实有存在的权利。然而，我们怀疑它们在评估气候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方面是否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证实的那样，气候议程和安全之间的直接联系没有得到科学的支持。我们顺便要指出，在地球存在的所有时期，都发生过气候变化，无论是气温上升或是下降，往往都对生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是审议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的关键机制，它们一直在有效地将各国召集在一起，共同处理这一全球问题。《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分工原则必须得到尊重，这些机构的工作不得被重复。

我们坚信，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发展系统以及《气候公约》和《巴黎协定》是应对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环境领域挑战的可靠平台。俄罗斯联邦随时准备继续在上述模式内与所有国家积极接触，以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后果。

弗雷泽夫人（马耳他）（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今天的重要公开辩论。我也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龙总统阁下和卡德里女士富有洞察力的发言。

我们一如既往，坚信气候变化是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以整体方式加以解决。正如秘书长所说，气候、和平与安全的关系不能被忽视或低估。事实上，气候变化是不稳定、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加剧因素。这清楚地表明，气候变化带来的多方面挑战是多么明显、多方面而且深远。强有力的科学证据表明，如果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得不到控制，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因此，这一证据需要改变范式，我们不能再在不同的轨道上处理冲突动态和气候脆弱性。

处于冲突中的地区往往是最易受气候影响的地区，气候冲击进一步加剧了不稳定。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非洲部分地区的水灾和干旱导致农业用地退化，

海平面上升影响到低洼社区和小岛屿国家。农牧民间暴力、粮食不安全、大规模流离失所，以及更广泛地说，国家状况错综复杂，这些趋势仍然是这一现实的一部分。

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气候引起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增加了早婚和强迫婚姻、招募儿童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和剥削的风险，致使不平等现象加剧。化学武器和爆炸装置造成的环境危害进一步加剧了水和能源短缺，也加重了妇女和女童的负担。

联合国各特派团在执行任务时，应加大对气候和环境后果的应对力度，因为这些后果影响到特派团在实地的行动。鉴于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一半在非洲，四分之一在中东，这些后果是毋庸置疑的。例如，由于严重的洪灾或干旱，道路往往无法通行，这影响了特派团的机动性和行动。考虑到这一点，马耳他仍然支持通过对与气候有关的风险评估和管理，辅之以顾及性别和年龄的办法，加强联合国特派团的任务。

在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和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部署气候、和平与安全顾问，对于了解这些特派团所服务的国家和地区的气候相互作用来说至关重要。联合国气候安全机制也仍然是我们各项努力的核心工具。

马耳他一直将关于气候-和平-安全的讨论作为其在安理会的优先事项的核心。我们在担任主席期间就海平面上升问题举行的公开辩论（见S/PV.9260）证明，许多代表团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挑战。这些挑战可能会对各国的基础设施、生计和安全--以及它们本身的生存--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最近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我国马耳他还有瑞士、莫桑比克和加蓬带头作出关于气候、和平与安全的联合承诺，反映了我们继续致力于注重气候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我们相信，这些承诺可以为现在和今后的安理会成员提供指导，确保这一讨论继续下去。

最后，马耳他仍然坚信，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值得安全理事会关注并采取行动。让安理会处理这些问题绝不是转移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或其他相关机构的关注，而是对它们的补充，并加强它们的独特作用。

霍查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召开本次会议，这是一次真正的努力，目的是将这一问题保留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并探讨具体方法，以促进提高复原力，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多重脆弱性以及日益增长的人道主义需求和安全威胁。

我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桑托斯·卡尔德龙总统和卡德里女士所作的通报。

上周，加拿大森林大火产生的浓烟弥漫本市和东海岸。它提醒我们注意气候变化与世界范围内野火数量和严重程度的增加之间的联系，这是气候崩溃的后果之一。

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在遭受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后果，包括洪水、干旱和令人窒息的高温。去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欧洲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有1.5万人死于高温，相比之下，全球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为6701人。全球数百万人丧生。气候变化已经造成饥荒、流离失所、动乱和不稳定。当气候变化的影响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压力相互作用，加剧脆弱性时，可能会加剧人们的不满，增加不安全和暴力冲突的风险。

在这个会议厅里，我们习惯于讨论不同国家和世界各地的一系列威胁。然而，气候变化是对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的最大威胁。它已经重创一些地区，但不会止步于任何边境，也不会放过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尽管警钟不断敲响，但尚未就安全理事会处理气候变化及其对我们安全的影响的必要性达成一致。这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发展问题。科学告诉我们，这不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危险。这是我们人类的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具有严重安全影响的重大而危险的破坏，所产生的后果影响到安全议程的根本核心。

海平面上升、荒漠化和极端天气事件可能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可能导致国内和跨境移民的增加，使社会和政治系统不堪负重。我们不要忘记：海平面上升仅不到两英尺就会危及许多太平洋岛屿上居民的根本生存。

气候变化可导致政治不稳定和冲突。在那些已经与贫困、治理薄弱和族裔紧张局势作斗争的地区，与气候有关的影响可能会加剧现有的不满。生计中断、缺水、粮食不安全，这些可能加剧社会动荡，增加暴力和恐怖主义的风险。相互关联的世界本身的性质意味着，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有可能影响其他地区。

安全理事会不能对气候造成的安全影响无动于衷。否认气候对安全格局的巨大破坏性影响并非解决问题之道，忽视这一事关生存的威胁也不应是前进的方向。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在一个脆弱且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这是一个严重的集体安全问题，包括我们所听到的那样，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亦是如此，这些行动面对日益严重的挑战仍然准备不足、装备不足。

我还要强调，气候变化对冲突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妇女和女童产生了尤为严重的影响。气候和环境行动和减少灾害风险需要注重性别平等，重视和促进妇女、女童和青年作为变革推动者所发挥的作用，并直接应对他们面临的各种风险。

本着这一精神，阿尔巴尼亚赞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今天上午代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瑞士、加蓬、马耳他和莫桑比克就对气候、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共同承诺所作的发言。

目标已经设定，路线图也很清晰：全世界必须团结一致，努力减少碳排放；我们必须在2050年之前达到碳中和；我们必须将温度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之内；我们必须增加资金。这就是路径。这是我们的生命线。

气候危机的紧迫性要求我们超越政治分歧和党派分歧，团结在共同的事业周围。气候变化给和平与安全、繁荣和福祉带来的风险是多方面的，挑战的严

重性和紧迫性要求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

正如克里国务卿早些时候所指出,用明确的话来说,事关信守承诺,每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可以选择继续在我们之间进行辩论、一拖再拖,但我们只会付出更高的代价,特别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而言。

德里维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副秘书长、桑托斯·卡尔德龙总统和卡德里女士所作的通报。

人们一再指出,在脆弱的背景下,气候变化是一个不断恶化的因素。在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20个国家中,有12个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国家一再提醒我们注意气候变化对其安全的影响。

然而,现在距离我们于2009年在大会第63/281号决议中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仍然很远,该决议呼吁联合国加紧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现在不是表态,而是采取行动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论坛上。这要求安理会充分动员起来。安理会必须能够更好地评估、预测和防止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并得出所有相关结论,以便联合国能够在实地采取行动。

因此,我想提出三项建议。

首先,安理会必须详细了解气候危机对最脆弱区域的影响。因此,我们呼吁特别代表在通报中为我们提供准确的信息,并为某些地区,特别是非洲提出有针对性的行动建议,在非洲,绿色长城等雄心勃勃的倡议正在形成。

第二,我们安理会必须更加强调预防风险。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特派团的任务授权,以便它们能够在评估和管理风险方面支持最脆弱的国家。还必须鼓励特派团确定具体行动,如南苏丹问题特别代表所做的那样,例如,提议将尼罗河变成一条非军事化路线、一个共同资产。

第三,我们必须继续支持联合国在实地的工作。部署到联合国特派团的气候、和平与安全问题顾问可以发挥特别有益的作用。他们帮助各国建立评估和管理风险的能力,并努力加强与地方和区域行为体的伙伴关系。法国为此动员起来,特别是支持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其他欧洲国家也动员起来。我们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

我们也鼓励联合国与部队派遣国一道,寻求在维持和平行动中执行环境战略,包括通过调动可再生能源来这样做。

我们呼吁会员国参与集体努力,签署加入气候安全机制,该机制的目的是在解决和平与安全问题时帮助纳入气候变化的影响问题。法国通过与德国一道担任该机制指导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

因此,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朝着这三个方向采取共同行动。地球不会等待我们。

石兼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召开这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我也感谢拉克鲁瓦副秘书长、桑托斯·卡尔德龙前总统和卡德里女士发表宝贵的意见。

气候变化以各种方式对所有国家构成迫在眉睫的严重威胁。例如,气候变化所致海平面上升威胁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正如安理会确认的那样,在非洲,大规模水灾、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等情况引发并加剧冲突。

无论产生什么影响,气候变化都会增加冲突的风险,而这些冲突反过来又会让各国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日本认为,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安全理事会应当正视气候安全问题。

减缓和应对是帮助减少风险和打破恶性连锁反应的主要行动。关键是增强各国的复原力,从而加速长期的强劲发展。安理会必须与联合国系统内外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如建设和平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驻地协调员和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全面协调与合作。

具体而言,日本一贯呼吁安理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加强交流。

日本也认为,安理会应当深化关于法治的讨论,因为法治确保人民和社区之间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以海平面上升为例,法律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是必要的基础,特别是对因海平面上升而面临各种不确定性的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沿海国家而言。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岸田首相3月份在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新计划中阐述的那样,日本重申其立场,即尽管气候变化造成海岸线倒退,但允许沿海国家保留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的现有基线和海洋区域。

日本这方面将继续协助加强易受气候影响群体的复原力。在日本担任主席期间,七国集团领导人上个月在广岛峰会上重申,他们致力于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调动高达6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各种挑战。在该伙伴关系下实施的各种项目中,我们支持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旨在提高其基础设施抵御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的能力。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还启动了高达15亿美元的加速建设具有气候变化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社会基金,以资助公共和私营实体旨在加快气候行动的基础设施项目。

最后,正如哥伦比亚前总统指出的那样,与自然和平相处并建立和谐关系是我们都必须应对的紧迫挑战。正如卡德里女士所说,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坚定的政治意愿。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我们都没有闲工夫去指责别人、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没有闲工夫去质疑证明气候与安全之间存在百分之百因果关系的科学证据,而目前损害正在实地发生。日本重申致力于与联合国、其会员国、国际机构以及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继续并加紧努力应对这一全球挑战。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匈牙利外交与贸易部长发言。

西雅尔多先生 (匈牙利) (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谨表示我们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赞赏和崇高敬意,

这不仅是因为它召开今天的重要会议,讨论和平与安全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这一非常紧迫的问题,而且还因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直在加强全球支持和平的多数国家及其支持和平的立场,并努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从我国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国靠近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这是一场区域性战争,但却具有全球影响,升级的威胁与日俱增。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死亡的人就越多。

我们生活在那场战争的邻近地区,我们都知道,如果战争升级,它将首先发生在地理上最近的地区,而不是数千公里之外。我也代表一个其国民正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的国家发言,我们不希望更多人在这场冲突中丧生。因此,我们认为,国际社会的目标和责任应该是拯救人民的生命,而做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和平,这意味着结束战争。因此,匈牙利敦促立即停火,因为这将给启动和平谈判一个机会,而有了和平谈判,就有希望达成和平协议。我们都确信,战场上没有解决任何战争的办法,包括我们邻近地区的战争,因为战场只会造成人员伤亡。解决方案必须始终来自谈判桌。

主席先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赞赏包括贵国在内的所有那些愿意为和平大声疾呼的国家所做的一切努力。不幸的是,我们还必须明白,目前战争的论调比和平的声音更响亮,尽管我仍然认为,全球多数国家都希望看到和平。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是时候更响亮地大声疾呼了,以便让全球支持和平的多数国家的声音能够被响亮而清晰地听到。

甚至在我们邻国的战争于2022年2月爆发之前,我们就已经生活在一个由加速的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移民问题以及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恐怖威胁造成的紧迫威胁和危险的时期。这三者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现在,除了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移民等威胁之外,这场战争还造成了另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战争的结果是,交战国的粮食出口下降,使本已脆弱的地区变得不稳定,粮食供应不安全为极端意识形态开辟了空间。当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激增时,恐怖威胁就会增加。因此,从全球来看,我们现在正面临有史以

来最严重的恐怖威胁。这是移民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我们都知道，大规模移民浪潮给了恐怖分子隐藏在這些浪潮中并在世界各地发动袭击的机会。鉴于我国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非常了解这一点。我们东面的邻国是乌克兰，那里的战争正在进行，迄今已有100多万难民来自那里。我国南部边境基本上是西巴尔干移民路线的终点，从全球来说，这是目前最活跃的路线。去年，我们不得不在那里阻止27万非法移民。

不幸的是，战争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战争每持续一天，就会增加发生其它自然灾害的机会。我们都知道，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正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运行。这助长了对核能的负面歧视和意识形态攻击，而核能实际上是一种清洁、安全和可持续的发电方式。没有核能，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的斗争显然没有成功的机会。

总之，乌克兰战争、不断增加的移民压力、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恐怖威胁，以及保护环境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斗争面临的巨大挑战，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国际社会应该齐心协力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可能很容易陷入一场完全无法解决的危机。

主席先生，我再次感谢你和贵国政府，特别是贵国外交部长，就一个非常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召开今天的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斯图尔特女士（加拿大）（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就气候变化及其目前和预计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这一严重问题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我谨代表我们三国政府，借此机会重申我们致力于与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8届会议（第28届缔约方会议）主席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建设性和协作性接触。我们共同坚定致力于多边参与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们真诚期待继续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合作，以确保第28届缔约方会议获得成功。

气候变化将给我们国家、社区和个人的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气候相关的灾害变得越来越频繁，强度也越来越大。这些和其它间接影响将在许多方面影响会员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一些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然而，我们确实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一个威胁倍增因素，加剧了原有的安全风险。海平面上升、极地变暖和越来越不可预测的天气与其安全影响密不可分。例如，我们在萨赫勒地区看到，对资源的额外压力加剧了现有的紧张局势和冲突。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挑战，我们需要共同更好地评估和理解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包括它如何影响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and 可持续维持和平，以及它对妇女、青年和土著人的具体影响。一些联合国和平行动已经记录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但只有当我们能够分享这些经验教训时，它们才是有价值的。同样，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以及青年与和平与安全领域取得的成功可能必须加以调整，以应对具体的气候变化影响。

安理会应继续推动将气候风险更好地纳入维和任务和做法。联合国还需要衡量和评估各种形式的援助和干预，如支持适应和复原力，如何影响安全成果。我们应该通过多边平台，如气候安全机制、建设和平基金以及德国和七国集团发起的“气候促进和平”倡议，交流最佳做法和政策干预措施。建立理解、分享这种吸取的经验教训并相应调整我们的行动应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这将有助于我们确保今天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以便明天取得更好的和平与安全成果。

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将与北约盟国一道，于2023年在蒙特利尔建立一个新的气候变化与安全英才中心，以更好地了解 and 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安全挑战。加拿大和创建卓越中心的其它11个北约国家把创建这个新中心当作一个独特的创新机会，使北约及其盟友能够帮助打破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人道主义工作并举中采取气候行动方面各自为营的状态。我们坚信该中心将提供一个在三者联系中加强协调努力的新平

台,以便更好地应对气候脆弱性,并提高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国家的韧性。

澳大利亚致力于加强它同印度洋-太平洋国家的接触,以促进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安全、善治、灾害管理、健康和韧性。例如,澳大利亚太平洋气候伙伴关系支持澳大利亚在整个太平洋的援助投资都能够考虑到气候和灾害风险,而妇女抗灾能力方案则与妇女署开展伙伴合作,支持妇女在气候和减灾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

新西兰致力于支持太平洋地区面对气候变化建设韧性和改善安全状况。新西兰的国际气候融资战略——Tuia te Waka a Kiwa——是新西兰兑现2022年至2025年13亿美元国际气候融资承诺的指导方针。至少50%的承捐款项将用于支持太平洋岛屿国家,至少50%将专门用于适应气候变化。新西兰的气候融资倡议将增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抗御力和适应能力,促进雄心勃勃的缓解行动,并提高机构的循证决策能力。此外,2018年以来,新西兰的防务政策正式确认气候变化很重要,是影响新西兰安全的两个最重要的长期趋势之一。

面对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共同威胁,我们要保持民众的安全保障,就必须前所未有地加强合作。要取得成功,我们的机构就必须实现变革,包括作出人道主义、发展、建设和平、防务和安全承诺。它还需要大量投资、专心致志的领导,最后还要真正致力于合作行动。我希望这次讨论促使我们大家采取这一共识,并参与抗击这一空前挑战。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马哈茂德先生 (埃及) (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首先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驻纽约机构,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我也要感谢姊妹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并在安理会充分代表阿拉伯利益。我还要感谢各位通报人:主管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先生、哥伦比亚前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龙先生,以及我们的同事,国际农业研究联合会气候、和平

与安全专家萨尔玛·卡德里女士。

气候变化是我们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主要危险之一。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加剧与冲突有关的紧张局势。国际社会必须全面应对气候变化,包括通过处理和安全的联系,因为气候变化的不良影响助长冲突和争端。它导致萨赫勒、非洲之角和达尔富尔等很多区域争夺自然资源以及有时干旱和缺水,从而致使流离失所者增多,这种状况影响阿拉伯和非洲区域的安全和稳定。

阿拉伯集团强调,必须促进联合国际行动,以应对这类挑战。在这方面,我谨提及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这包括干旱、缺水、海平面上升、荒漠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森林火灾。值得一提的是,全世界接近25亿人当前正遭受缺水之苦。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翻一番。阿拉伯国家大约90%的民众缺水,此外,阿拉伯水安全方面的紧张关系加剧。确保阿拉伯粮食安全也是一个挑战。

第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指出,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需要大约5.6万亿美元来落实其国家自主贡献。

第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也提及,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适应项目的费用将达到3 000亿美元左右。

阿拉伯集团强调,解决气候变化的根源和适应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将为减少和平与安全挑战做出有力贡献,尤其是气候变化导致的安全挑战。除非发达国家按照《气候公约》履行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承担的财政义务,特别是达到1 000亿美元的年度目标,否则无法实现这一点。优惠融资必须成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金融工具的一部分。最迟于2025年增加1 000亿美元融资仍然是我们大家必须共同努力完成的一个优先事项。我们支持秘书长呼吁划拨50%的气候融资,用于适应措施和韧性建设。这有助于我们解决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阿拉伯集团支持国际社会努力遏制气候变化的危险。沙姆沙伊赫市在2022年主办联合国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第27届缔约方会议)时,证明了这一点。会议成功达成了符合发展中国家愿望的重要成果,尤其是作出设立气候变化问题损失和损害基金这一历史性决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今年将在迪拜主办第二十八届会议。阿拉伯集团期待会议通过各项决议,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后果。阿拉伯集团赞扬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两个主席国开展密切合作,确保顺利交接。

我们还赞扬所有相关倡议,特别是姊妹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绿色中东倡议,以及第二十七届会议主席国埃及的气候对策倡议,该倡议旨在按照国家自主性和特殊性原则,保持和平与发展。

阿拉伯集团强调必须以全面方式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以找出根本解决办法,解决这一生存挑战。我们将有效参加所有国际会议和论坛,为应对这些挑战和确保所有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德国代表发言。

伦德茨女士(德国)(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作此发言,这个小组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由全世界各区域的66个成员组成。

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因共同关心的问题走到一起,这个问题就是:气候变化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挑战。它日益威胁生计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繁荣和稳定,因此对和平和人类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因此,我们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召开今天重要和及时的辩论会。

在我们发言的此时此刻,国际社会的同事们正聚集在波恩,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第28届缔约方会议)的谈判做准备,以期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取得急需的实质性成果。为了使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缔约方会议取得成功并采取大胆措施遏制全球变暖,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在气候行动方面树立更大的雄心壮志,以实现《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以及《巴黎协定》所设定的目标。

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C范围内至关重要。此外,最大限度地减少今后的变暖,将降低触发临界点和相关挑战的风险。但这只是我们所面临挑战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再也无法防止气候变化的所有负面影响。特别是在脆弱的环境中,这些影响成为风险倍增因素。因此,我们还必须投资于适应措施,以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整个联合国系统应当在所有相关论坛和所有相关任务中应对这一复杂挑战,本组织已经在这方面开展重要工作。气候安全机制是机构间合作的典范,加强了联合国系统分析和应对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不利影响的能力。我们鼓励所有会员国继续支持和参与该机制。

建设和平委员会最近就气候变化对安全与稳定产生直接影响的特定区域——如太平洋岛屿、萨赫勒和中亚——举行的会议非常令人鼓舞,因为这些讨论是在受影响国家的倡议下发起的,并提出了反映其生活现实的挑战和机遇。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若能考虑这些会议以及今后关于该问题的建设和平委员会会议的结论,将大大受益,安理会可以通过委员会的书面咨询意见获得这些结论。

鉴于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它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友小组欢迎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安理会在审议维持和平特派团与政治特派团的任务时,日益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事实证明,由安理会成员组成的气候与安全非正式专家组在为安理会工作提供参考方面至关重要。之友小组也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的一些当选成员——马尔他、莫桑比克、瑞士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带头作出联合承诺,始终一贯地在安全理事会处理气候与安全问题。

这些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还必须作更多努力,包括在安全理事会内作出努力。之友小组一再呼吁安理会创建具体工具,使联合国能够在预防和解决至少部分是由气候变化影响造成的冲突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呼吁考虑采取具体、切实的行动。

这包括秘书长定期报告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以及秘书长任命一名气候、和平与安全特别代表,特别代表可以加强联合国相关实体之间的协调,以提高本组织应对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能力。

此外,安理会应当利用与气候相关的预警系统,这些系统也应包括预防冲突、调解和建设和平的功能。我们应当始终在所有相关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与政治特派团的任务中酌情考虑气候风险。事实证明,气候与和平与安全顾问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为综合解决方案提供了有依据的专门知识和建议。安理会应当鼓励所有联合国特派团,特别是维持和平特派团,改善其环境足迹,并增加其环境管理行动。联合国会员国达成了广泛共识,即安全理事会也应当在具体国家或区域局势中提及与气候变化有关

的风险。因此,安理会必须确保迅速通过关于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以及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的主席声明,这两个方面的声明分别自2019年(S/PRST/2019/10)和2021年(S/PRST/2021/16)以来一直没有发表过。这样做也符合有关国家的愿望。

由于气候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社区经历了不安全和不稳定。之友小组敦促安全理事会及其成员满足这些国家提出的行动要求。我们随时准备支持所有旨在加强全面风险评估、能力建设和行动对策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 本次会议发言名单上还有一些发言者。鉴于时间已晚,征得安理会成员同意,我打算暂停会议,下午3时复会。

下午1时15分会议暂停。